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一七期 ——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712d)

---

【人物春秋】	林彪——最经得住研究的人	王年一
【专题研究】	短暂的蜜月：1966年毛、林关系的几个问题	余汝信
【文革一页】	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红卫兵	吴丽萍
【书评】	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	舒 崇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人物春秋】

林彪——最经得住研究的人

• 王年一 •

欣闻丁凯文先生主编出版新书《百年林彪》，我为此十分高兴，因为我万分敬重林彪。今年是林彪诞辰一百周年，中国人应该纪念他。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林彪被妖魔化了三十年，而且由社会主义国家用国家的力量来妖魔化，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子，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真善美与假恶丑完全被颠倒了。对此，我的心中又充满了悲愤。

香港的学者冯治军著有《林彪与毛泽东》一书（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求真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冯先生在《序篇》中说：“林彪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终结的掘墓人。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也是从1971年‘九一三’开始转弯。”

有人说得好：“‘文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1〕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自我评价，肯定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2〕毛泽东研究权威李锐在“马克思”后加注：“实为斯大林”。毛泽东又对斯诺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一生迷恋乌托邦，长久在空

想的道路上徘徊。

林彪在“文革”中是“副统帅”，至今为人所诟病。其实，林彪被强推上“副统帅”宝座，十分不愿意。他多次向毛泽东辞职，均未获准。不要林管政府工作（政府工作由周恩来管，政府工作也非林彪所长），不要林管“文革”，（“文革”由江青管，他人不得干预），军队工作由“军委办事组”管，林彪身体又不好，乐得什么也不管。林彪自己总结了经验：“毛主席画圈我画圈”。有时连圈也懒得画，叫秘书代画。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在2003年11月6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写出了一些难得的史料，虽然长一些，却很有意思，很能说明问题，敬请读者诸君耐心一读：“在军队任职，自然会和林彪打交道。当我问父亲对林彪印象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政治局会议上，我参加过讨论工业、农业、财贸、整党、外交等各种问题，一个国家，头绪很多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这我就奇怪了。这位副统帅，究竟在干什么呢？……’”

“父亲还讲过他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情况，也很有意思。1971年夏天，周总理带着黄永胜、张春桥和我父亲一起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父亲说，他向林彪汇报的问题是：‘军队现在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多个副职……’他请示林彪：‘林总，你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林彪听了以后说：‘就是啊，那怎么办呢？’我问父亲：‘那林彪说怎么办呢？’父亲说：‘情况给他谈了，可他也不说个办法。就这么一句，没有下文了。’”

谢谢纪坡民，写下了这些珍贵史料。我和几位朋友合作，发表过《林彪在“文革”中是逍遥派》的文章。毛、林交恶，出于毛的主动。多疑的毛笃信“有军则有权”，对掌握军权的林不放心。毛怕军队坐大而尾大不掉。毛在1967年武汉蒙难时，就感到军分区的75%支持右派，从而迁怒于林，并决定武装100万左派（这是“第二武装”的由来），林彪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此后，毛对林、陈的“九大”政治报告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极为不满，加深了对林的“二心”的怀疑。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其中有不少军人：全国“三支两军”的军人更多；各地的“革委会”，其核心都是军人；中央各部委，其领导人不少也是军人；“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是林彪的老部下。如此方方面面，加起来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其实这一切都是毛造成的。“三支两军”是毛的要求，“革委会”的“三结合”是毛的指示，“军委办事组”的组成经过毛的批准，“九大”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成员的确定更经过毛的首肯。毛自己造成的结果，却由此怀疑林的不忠——翻云覆雨已是毛的故伎。

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说过，苏修说我们是军阀官僚体制。毛反驳了这个说法，可见他对“军阀”颇为介意。毛恣意妄为，一无所恐，怕只怕林彪不听话。毛、林互派“卧底”，了解对方的动态。“文革”倒行逆施，命运多舛，毛的忧虑日益加深，对林的疑心越来越重。毛说过“不怕黄永胜造反”，黄永胜从来没有造反，这句话不过反映了毛怕军队造反。毛多次表示他要自己管军队，也反映了他对军队不放心。这成了毛的一个心结，九一三事件由此而起。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十分悖理，但他的意愿不容拂逆，认定庐山上发生了“八月逆流”，毛决定与几十年的老部下分道扬镳。毛个人决定中共中央成立组织宣传组，把中共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交给江青一伙，无情也无理地打击和羞辱林彪一伙。老人家极度专横，下手很重，“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林彪不可能不作自己的打算。

林彪有病。毛泽东也有病。病夫治国，成了中国的特色。不少作者写过林彪的“病”。《南方周末》发表过建国初期林彪的老司机的长文，谈了林彪的“病”。张云生在其作品中讲了林彪

的“病”，冯治军先生在《林彪与毛泽东》中用一章的篇幅讲了林的“病”，林的众多的秘书们无一人否认林有“病”。林彪怕水、怕风、怕冷、怕热。林从不住在水边，怕水怕到了不能看到山水画的地步。林办工作人员王淑媛老人对我讲过：林彪怕水，半年中只洗过一次脚，而且只洗了一只脚。林怕风怕到了不能容忍秘书在他面前翻动文件的程度。林彪不吃鱼，不吃肉，不吃海鲜，不吃水果，这能算正常吗？他有什么必要装给工作人员看呢？众所周知，林还有不少独特的习惯，如准备讲话的“拉条子”，代替散步的“转车”，没有办公室，室内没有电话，等等。有一件事证明林彪有“病”：他在建国以后就与叶群不同房，叶群在家乡写过一篇日记，痛骂林彪毁了她的青春，林则始终觉得对不起叶群。一个人，从40几岁起就没有性生活，这能没有病吗？

毛、林的个性都极强，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他们二人在“文革”中渐行渐远。张云生为林彪“讲文件”，讲各地的武斗，林彪听了哈哈大笑，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3〕这是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无情嘲讽和鄙夷。冯志军说：“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每一个重大的方针决策，几乎都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毛泽东不愿意，也不需要与副统帅研究、商量。”〔4〕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多次要求与毛交换意见，得不到毛的批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林的内心必有无限的酸楚。林彪又渐渐地看清了“文革”的丑恶。林多年潜心研究过毛泽东，被抛弃的林此时如同“弃妇”，决心同毛决裂。毛去南方巡视，作了歼林的部署，又有意无意地泄露消息，以敲山震虎。毛打算在1971年9月底、10月初召开中共九届三中全会清算林彪，林彪则决定破釜沉舟，先发制人。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举。“九一三”事件有太多的不清楚，有太多的不正常，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明这一事件是林彪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但我们可以作些许分析。林彪可以不走，但他走了。他可以到广州和香港，但他没有去。专机飞到了蒙俄边界，但又折回了。不妨说，足智多谋的林彪元帅要以一死粉碎该诅咒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使数千万鲜活的中国人的生命非正常死亡的毛泽东时代。以一死而拯万民，林彪堪称“伟大”，彼时彼地，林面对强大的毛泽东，作了最好的选择。他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摧毁“文革”。“庆父不死，鲁难不已”，林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林在极其被动的情势下，与毛作殊死的争斗。万世骂名不足惧，但求苍生得太平。古往今来，林彪是中华第一大英雄。果然，九一三事件令不可一世的目空一切的毛泽东陷入了一生中最巨大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林彪事件”成了毛泽东的“滑铁卢”，是毛泽东不可言说的无法弥补的致命的创伤。毛泽东那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声誉、威望与尊严，都受到了严重的、无可挽回的损害。9月13日在温都尔汗的那一声爆炸，将毛泽东的精神支柱摧毁了，毛的自信、自负消失了，毛一下老了许多，很快就大病了一场，毛的精神基本上垮了，而且从此一蹶不振，苟延残喘，一步步走向人生的终点。林彪死了，毛尽可以把林当作替死鬼，但毛的健康不再，“文化大革命”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如果一切如我们所说，林彪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可大了！

九一三事件极大地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因为有了“九一三”，毛才那么快地那么多地解放干部。

“五七一工程纪要”不是林彪的作品，但无疑受到过林的影响。这个材料，打响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

人们在破口大骂林彪的时候，要想一想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网上文章《倾听历史的声音——千秋评林彪事件》说：“中顾委常委某人对邓小平说，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在，把历史弄清楚，给林彪平反。”邓小平答：“这是要毛泽东还是要林彪的问题，没的说。”（以上均为大意）邓小平这话似乎不对，歪曲历史对人民不利，对共产党不利，任何

冤假错案都应该平反。是非不分，只能为害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作为历史人物，总要任人评价，国际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毛是20世纪国际三个大独裁者之一（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毛在中国当皇帝27年，中国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人，这就为毛的执政作了鉴定。毛有很多优长，学识渊博，雄才大略，但品质恶劣，自信、自负，自以为是，口是心非，翻云覆雨，怙恶不悛，嫁祸于人，绝不认错，形成了许多坏的传统。中国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但要下决心清理毛的传统，要懂得认错和检讨。愿我们趁林彪诞辰一百周年之机，共同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林彪。

（1）李靖炎《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

（2）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28页

（3）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108页

（4）冯志军《林彪与毛泽东》香港皇福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12月第4版，513页

（编者按：此文为王年一教授为《百年林彪》所撰之序言。）

~~~~~

## 【专题研究】

短暂的蜜月：1966年毛、林关系的几个问题

· 余汝信 ·

中发〔66〕400号中共中央文件，不仅标题与“5·16通知”一模一样——仅为“通知”二字，而且，其重要性与“5·16通知”亦可谓不相伯仲，如果说，后者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那么，前者不仿可以说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组织保证。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一通文字，加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于8月7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予与会者。《炮打司令部》表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当即要挪动刘少奇党内第二把手的位置。

8月6日，已请假在大连养病的林彪，被毛泽东下令用专机接回北京，出席会议。同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了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次序。”（1）8月12日，即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全会通过中发〔66〕400号文件所列的补选、选举事项名单。

所谓名单是“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小范围”？王力有如下说法：“常委名单是毛主席亲自提的，经过林彪、周恩来、江青同意。这次大会实际组织者是周恩来，名义上是陶铸。周恩来把名单拿来征求林彪、江青的意见。毛主席原来安排的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江青说，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还升了？原来是第七位，现在升到第四位，这怎么行？要把陈伯达排在邓小平前面。江青又说，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来。这样就成了陶铸第四，陈伯达第五，邓小平第六。毛主席同意了。这说明毛主席还是要用邓小平，剥笋政策还没有剥到邓小平。不过这么大的事不该江青参与。江青那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2）事情经过到底是否如王力所言？难以考证，作为一家之言暂且听之吧。但名单不啻是向全党宣布：中共第二把手已从刘少奇换成林彪，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 一、“林上”前的一些铺垫动作

毛泽东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刘下林上”？研究者往往意见不一。而毛泽东自己对“刘下”却有一个说法，见之于1970年12月18日毛答斯诺问：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那就早罗。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3〕

毛的意思，是在1965年初。既然如此，那么，是否自那时起，毛泽东就已经属意“林上”？今天回过头来仔细梳理一下材料，1965年暂且不谈，我们发现，进入1966年以后，树立林彪威信的行动，的确是一步紧一步地向前推进。

1966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着重提及：“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检查和总结两年来的政治工作，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同志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问题。”

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由林彪于1965年11月18日提出，其第一项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该五项原则于当年11月20日经毛泽东批复同意，〔4〕作为1966年全军工作的方针，“遵照执行”。

萧华称：“林彪同志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不仅是我军一九六六年工作的方针，而且是我军建设的百年大计，是全军各项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也是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指示，是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根据我军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光辉榜样”。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林彪同志委托”六字，为毛泽东所加（5月2日，中央收回该文件，5月5日，另换了一个新批语重新发出）。

5月10日，新华社在一则毛泽东会见并宴请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新闻稿中提及，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林彪及邓小平。〔5〕文革前新华社绝少报道林彪公开露面的消息，更何况是会见外宾，因此，林的这一露面似另有深意。

5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即“五七指示”。

5月18日，林彪在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政治局常委的委托，首先讲话。这一讲话在文革前期评价甚高，影响深远，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变为批林的靶子。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秘密来华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谈及了接班人问题，并多处赞扬了林彪。毛称：“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

的漳州。是我同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都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6〕

6月19日，《人民日报》不寻常地将林彪当年3月11日“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的大部分内容，以大号字体发表于头版头条，并配以大字标题：“毛主席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工农中去能转化为巨大物质力量”。信中称：“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7月3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建议，将中央转发的《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像一九五九年主席的六条指示信（党内通信）一样，印发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基层支部中去，直接向广大党员和群众宣读，并认真组织讨论”。〔7〕

## 二、林彪“五一八讲话”

5月18日上午，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二、对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阐述。

有关第二个问题，林彪所强调、以后又最为人所诟病的是这么一些话：“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林彪不善言语。现在所看到的他的讲话文本，并不是他发言时的原话，林彪说话，语言远没有这般流畅。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讲话文本，已经过旁人精心润色。据戚本禹告诉笔者，林彪的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由戚作进一步加工，戚基本上是按记录稿作了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润色，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8〕

不可否认，讲话文本中的思想精髓是林彪本人的。戚本禹日后也承认，林讲话“有点历史唯心主义”，惟林彪看过整理稿之后十分满意，称赞戚是高水平的整理。

经过整理润色的讲话文本，文字铿锵有力，甚具戚本禹文风。其中经过再修饰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写进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表明它已成为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共识，亦为毛泽东本人欣然接受，要不，它怎么会出现在经毛反复三次审阅过的全会公报中呢！（9）

8月1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将林彪“五一八讲话”作为会议文件之一，印发予与会者。（10）

9月22日，中共中央将林彪“五一八讲话”以中央正式文件发至全国县、团级党委。

### 三、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六年后于1972年5月曾作为“绝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五”印发，始为世人所闻。现可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71—74页见到据说是该信修改件的全文。由于这封信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才浮出水面，且中共从来未有公布过该信或该信修改件的影印件，其真实性一直备受质疑。

江青曾于1972年5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过三次发言，解释这封扑朔迷离的信，经“综合整理”的江青讲话称：“一九六六年，中央在杭州开四月会议，当时我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五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也不知道会议情况”。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当时和现在，我始终认为，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中讲了世界革命问题，所以，也是写给全世界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象我这样的人。

“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几日才批发”。（11）

江青并没有说明，她收到的那封信的原件，最后到哪里去了？也没有说明，中共为什么不公布毛“做了亲笔修改”的抄件的影印件，以释众疑。

2003年12月笔者见到戚本禹时，曾问戚：当时他作为中办秘书局负责人，是否知道有这么一封信？为什么今天我们看不到这封非同寻常的重要信件的原件？

戚答：“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得毛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亦抄了一份”。〔12〕

笔者：毛的信，传阅者可以抄吗？

戚答：“可以。据我所知，周处还有大量的毛其他批件的抄件。”

笔者：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秘书的抄件。

戚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周恩来的抄件”。

笔者：那么，在江青处的原件呢？

戚答：“林彪知道毛有这么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好有人作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叶才离开”。

笔者：有人怀疑，现在发表的抄件，与烧了的原信有出入。

戚答：“我没有看过原信的内容，不好评论。但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为什么要有出入呢？没有必要作改动。原信对林彪肯定是有些不利，否则，叶群不会那么紧张兮兮”。

关于原件及抄件，除以上江青、戚本禹的解释外，还有多种说法，有学者已一一列举，此处不赘。〔13〕关于该信的真实性，笔者倾向于相信戚本禹的解释，惟1972年公布的抄件修改件究竟修改了些什么？中共官方为什么讳莫如深，不能将其影印件公诸于众呢？

毛泽东在信中称，对“我的朋友”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表面上的确对“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吹捧表示过“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惟即使在当时，毛还是需要个人崇拜的，他后来对斯诺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14〕

一方面“感觉不安”，一方面又“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到底那一句才是毛泽东的真话？又让人怎么行事？

笔者认为，需要个人崇拜，而且不止是“一点”，才是毛的真正心思。

不如此，就难以解释毛为什么同意将“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写入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去。

不如此，就更难以解释毛为什么要在1966年下半年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让千百万人高呼类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的口号，甚至赞颂他为“红太阳”——“人们说天上的太阳最亮，可是亮不过毛泽东思想的光芒，各族人民热爱您呀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充斥着类似语言的新闻稿，多经过毛泽东本人的审阅，而这些今天看起来如同对封建帝王的颂词，比起林



彪所用的词语不是更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 四、陶铸的报告

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陶铸报送的新华社电讯稿《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会议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送审稿上批道：“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7月29日，陶铸就毛上述批示给中央、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内称：“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央宣传部委托熊复、唐平铸两同志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作了讨论”。

“大家肯定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开始从解放军报宣传，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普遍运用的语言，非常深入人心……”。

“主席指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考虑到群众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因此，大家建议采取如下的步骤……”。〔15〕

报告建议的步骤归纳为三项：1、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在群众稿件中有这类语言的，还应当保留一个时期。二、外国朋友赞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应按照他们的原话报道，不要用推论的方法去“加码”。有些不符合主席此次指示精神的话，仍可报道，但不要用在标题上。三、“反党黑帮”必然会利用我们改变提法的机会向党反攻，从根本上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揭露他们的阴谋。〔16〕

8月4日，中共中央将陶铸的报告发至省军级党委，“望注意掌握，遵照执行”，并明确该文件“不往下达，不登党刊”。

在论及文革初期的毛、林关系时，研究者一般只注意毛给江青的信，其实，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7月25日的批示及随后中共中央转发的陶铸的报告。此其中可深入探究的问题应该还不少，譬如：毛这些话，是对林彪不满吗？毛是真心的，还是做样子给人看，假谦逊？当时宣扬这些语言最积极的，又是什么人？

陶铸的报告，指是“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虽然也称其为“是正确的”）。诚然，“顶峰”、“最高最活”一类语言的创始人，确实是林彪。据有关资料，“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最早出自于林彪1960年10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当代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早出自林彪1964年12月关于1965年政治教育安排问题的指示。类似这些话，是林彪1960年代初期在军队内部讲的，大约1966年初在地方广泛流传。〔17〕而地方上的宣传和影响，并不是林彪能加以控制的了。

其实，当时宣传最卖力的，就是以陶铸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南局。

1966年1月16日，中南局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即称：“毛泽东思想是在新的伟大革命时代全面系统地发展了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时代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必然会产生伟大的革命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战胜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现世界革命，最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旗帜”。〔18〕

中南局的《决定》里，既有“顶峰”，也有“最高最活”。2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南局的《决定》，在该消息上面是通栏大字口号“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所指的“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在这一版上全齐了！

此前，2月1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包括中南局上述《决定》在内的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三个文件。〔19〕

更有甚者，更前些时候——2月3日，中南局所管辖的《羊城晚报》，即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的社论。社论在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后称：“代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的伟大旗帜，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新的伟大革命时代全面地系统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20〕

4月5日，《羊城晚报》发表社论《再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内称：“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光辉顶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21〕

5月29日，《羊城晚报》再发表社论《三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内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指路明灯。……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而且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中享有最崇高的威信，成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旗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肩负的空前伟大的历史任务，就更需要自己的英明领袖，需要具有最伟大天才的革命舵手”。〔22〕

虽然，调子高得不能再高的“三论顶峰”，中央各大报刊并没有转载，但批准这些文章出炉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却正受到进一步的重用。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定，调陶铸到京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以填补打倒“彭、罗、陆、杨”后的主要空缺。

毛泽东后来说，陶铸这个人不太老实，似不无一定道理。即如陶铸给中央、毛泽东的报告，首先就没有提及自己近半年来宣传“最高最活”、“顶峰”这类语言，调子是最高的，态度是最积极的，更不用说对此有所检讨了。轻轻一句“大家肯定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是正确的”，更是用心良苦！是好是坏都是林彪的，反正是与己无关。

至于毛泽东的表态是真谦逊还是假谦逊，研究者自然还可以一直讨论下去（笔者认为，后者居多）。惟有论者批评林彪是借树立毛的威信来树自己，笔者却不敢贸然认同。说林彪是别有用心，那么，陶铸的用心又是什么呢？陶铸是否也是借树立毛的威信树自己？

## 五、“林副主席”

无论研究者们如何去解读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以及7月29日对陶铸报告的批示，却都抹杀不了那么一个事实：在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改选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将林彪的排名向前挪了四位，林彪成为了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

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名单，除毛泽东本人及周恩来的位置没有变化外，林彪从第六位变第二位，而原分别排在第二、四、五位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则分别排在常委中的第八、九、十一位，刘、朱低于并非中央副主席的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陈云除此之外甚至低于李富春，是常委中的最后一名。原来的中央副主席，位置反而低于一般的常委，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故而，八届十一中全会既不能宣布取消党的副主席，也没有对党的副主席进行改选，因为改选毕竟牵动太大。会后的公开讯息，没有再提起中央副主席这一职务。没有再提，主要并不是因为林彪地位的上升，而是刘少奇、朱德、陈云地位的下降。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中央副主席，王年一先生的《大动乱的年代》称：“全会并未重选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却于会后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23〕席宣、金春明先生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则称：“全会没有改选主席、副主席，而会后在任何文件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都不再提及，被不明不白地取消了。而林彪仍被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是唯一的副主席。”〔24〕

类似说法，几成定论。而笔者认为，以上说法与史实有出入。

一、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宣传部门对提及林彪时所用的统一口径，是“林彪同志”。自8月18日新华社报导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起，提及林彪时，称谓用的都是“林彪同志”。如“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林彪同志在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讲话”，“林彪同志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向大家问好。”〔25〕年内的多次接见，新华社电讯沿用的仍然是“林彪同志”不变，此一状况，一直延伸至1967年年中。

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十分偶然的会使用“林副主席”一词，如10月17日的一则电讯标题则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关怀归国侨胞”，电讯所称的“林副主席”，并没有特别注明是中共中央的副主席。笔者认为，一如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有关军队工作的消息提及“林副主席”般，可以理解为此处主要指的是林彪的另一个重要职务——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即便是1967年中期以后才经常使用的“林副主席”的称谓，也从来没有注明是中共中央的副主席。

中共的宣传机器倒是为林彪专门特设了一个称谓，即“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第一次使用，是《人民日报》发表于8月20日的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内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百万大军。”〔26〕

又是身穿军装，又是“亲密战友”，即便称“林副主席”，强调的不是军委副主席，又是什么？

## 六、“接班人”

经查证，至少在1966年全年时间内，中共宣传机器除了宣扬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外，并没有公开发布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类似提法的信息。据目前的资料，有关林彪是“接班人”的提法，最早见于群众组织传抄的叶剑英在1966年9月一次公开接见时的讲话。

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艺术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说：“最近时期，

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能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俩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俩个，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俩个，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的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27）

叶剑英在这里说，林彪是毛选定的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有违事实，亦显然与毛在1960年代初的构思大相径庭。毛的“第一个”，不是林彪，而是刘少奇。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曾经回答过蒙哥马利关于毛的继承人是谁这一问题。毛泽东当时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28）

叶剑英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是军队的重量级人物。他对林彪的拥戴，代表了军队相当大一部分高级干部的态度。

10月5日，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学员时再次提及林彪：“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可庆幸的大事。还应指出的是，毛主席从1928年经过38年观察，林彪同志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各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龄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59岁。是领导中最年轻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最年轻，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29）

## 七、“九一八讲话”与《再版前言》

9月18日，林彪在接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李志民、蔡顺礼、李曼村等负责人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在谈话中，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行动的纲领。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李达、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比？现在中国、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的著作能统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离我们太远。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把毛泽东思想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这是革命的教科书”。

当蔡顺礼说：“我们说主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些人就专门找哪里发展了”时，林彪称：“主席的水平比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他的水平”。

林彪还称：“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有这种民族自卑感，就丧失革命斗志。……总觉得洋人古人比我们强，其实那有比毛主席高的？象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上千年都没有。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30）

以上讲话，由参加接见者于9月18日当晚整理，相信可信程度甚高。林彪此次讲话虽然没有了“最高最活”“顶峰”一类的提法，但有“象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上

千年都没有。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类似的更过头的话。有论者说，林彪极不相信毛泽东是真谦逊，为了自保，才说这样的过头话。惟不管是什么原因所致，林彪这些话都是错误的。

“九一八讲话”应该打上林彪的印记。但流传甚广的以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原来却不是林彪本人所为。

据知情者透露：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再版本，于1965年8月1日出版。编印单位和“前言”仍署“总政治部”，由52开本改为64开本，用红塑料皮封面，发行范围仍限部队内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负责编选语录的《解放军报》社按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对“前言”进行了修改，主要为加上了“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一句话。在交稿审定时，在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争议：一是仍署“总政治部”，一是为便于出口，署“人民出版社”。两种意见上报，最后转到中央文革小组，12月1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开会，会议决定，将原以“总政治部”署名的《再版前言》，改以林彪署名。12月17日，全国报纸以显著位置发表了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31）

## 八、简短的结语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距离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已有整整四年的时间。在几乎一届党代会的四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召开中央全会，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时代党内政治生活的极不正常状态。在此四年时间里，毛泽东因政策分歧与他原来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务工作系统高级干部势力，渐行渐远，而与掌管军队的林彪，以及以林彪为代表的军队高级将帅势力，渐行渐近。此种趋势，以1963年全国大学解放军为发端。至1966年初，林彪地位的上升已有迹可循。这是一个起码有半年时间的缓慢的预热、造势过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形成了有备而来的既成事实。

总体来说，是毛泽东要依靠林彪以及其他军队高级将帅，以围剿刘少奇及其党务系统势力，而绝不是相反，林彪要靠拢毛去达至他个人的什么目的。请尊神，不仅江青如是，毛泽东也如是。在此过程中，林彪以自己独特的语言，首先在军队中巩固和树立毛泽东的至上权威，对此，毛是欣然接受的，惟表面上又不得不假谦逊一番。树立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风气假文革的浪潮很快席卷全国，毛泽东本人也采取了诸如八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一类迅速扩大自己权威性的做法。

不仅是林彪，中共其他高层对树立毛的个人崇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陶铸，就是其中甚为积极的一位。周恩来也不例外，如有关毛是天才，周恩来就说过：“……因为有时学习语录不够，还要查一查语录的原文，才能了解主席根据实际情况，世界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如何天才地、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才能看到文章的时代背景和伟大的天才”。（32）“所以林彪同志说的很对，毛主席是列宁以后的二十世界最伟大的天才”。（33）

林彪党内第二号人物以及接班人地位的形成，是由毛泽东本人最终拍板的。党内军内，也有不少人极力维护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其目的不排除大部分是为了抗衡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势力），如叶剑英的两次讲话，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1月）

##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429。

- (2)《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页617。
-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73。
-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80。
- (5)《人民日报》1966年5月11日,第一版。
- (6)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1966年6月10日。部分谈话见【1】书,页1418。
- (7)见中共武汉市委文件武发[66]074号“市委关于转发‘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的通知”,1966年8月18日。
- (8)见笔者首发于电子杂志“枫华园”2004年1月9日第401b期的《与戚本禹面对面》。
-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96。
- (10)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页59。
- (11)《江青同志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中共北京市委办事组1972年8月2日翻印)。
- (12)以上及下文笔者与戚本禹的对话,见《与戚本禹面对面》。
- (13)见何云峰:《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
- (14)同(3)书,页174。
- (15)中共中央文件口中发[66]394号,1966年8月4日。
- (16)同(9)书,页86。
- (17)类似材料,如《林彪同志谈学习毛泽东思想(辑录)》,见《福建通讯》1966年第13期(中共福建省委福建通讯编辑委员会编印,1966年8月1日)。
- (18)《人民日报》1966年2月24日,第一版。
- (19)《中央转发中南局、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三个文件的批示》《福建通讯》1966年第2期(1966年2月20日)。
- (20)《羊城晚报》1966年2月3日。
- (21)《羊城晚报》1966年4月5日。
- (22)《羊城晚报》1966年5月29日。
- (2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页60。
- (24)席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页98。
- (25)《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 (26)《人民日报》1966年8月20日。
- (27)《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一集(佚名编,1966年10月),页152—153。
- (28)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173。
- (29)同(23)书,页189。
- (30)《林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的讲话》《林彪反党言论(部分材料)》(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室,1972年7月2日翻印)。
- (31)方厚枢:《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始末记略》,《出版史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 (32)《周恩来同志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北上”、“南下”、“西进”战斗军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6.9.10)》,《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一集(佚名编,1966年10月),页120。
- (33)《周恩来同志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体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1966.9.26)》,《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一集(佚名编,1966年10月),页159。

~~~~~  
【文革一页】

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红卫兵

• 吴丽萍 •

提起“文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这人妖颠倒的十年里，那些风光无限、狂飙突进、充满暴力、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形象，并为这些无知无畏的年轻人扼腕悲叹。然而，人们往往忽视对红卫兵这一团体进行性别区分，待人们猛然意识到女红卫兵群体的独特性存在时，审视她们的所作所为，又不由得惊叹：一向纤弱温柔的女性为何会如此凶残！仅举几例，便很能说明问题：

“女红卫兵的残酷印象事后往往使人匪夷所思，一个女红卫兵挥舞著带铜头的皮带，向一个老者的头上打去，一抽一个眼珠掉下来了，形象极其的恐怖。”（1）

“师大女附中的校长被一群女红卫兵当场打死。”（2）

“有一位豪门千金，曾是狂暴地揪斗殴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组织者之一。”（3）

“突然，一个女红卫兵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有看到我们的布告吗？’”“‘好啊！你竟然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见鲜血。”（4）

.....

“文革”中的女红卫兵形象何以凶残至此？这凶残的行为背后有其怎样的社会氛围作导向？女红卫兵们在政治运动中的真实心态是甚么模样？以及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结束后，女红卫兵作为女知青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本文试图通过追溯女红卫兵的“前世今生”，力求还世人一个较为真实、清晰的女红卫兵形象。

一、女红卫兵的过去式：建国后女性神话的崛起

众所周知，新中国标榜的是打倒一切旧有秩序，与“万恶的旧社会”彻底挥手告别，全面进入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天地。在这除旧布新的滚滚潮流中，有关两性地位的颠覆、性别压迫的消弭等问题，也被顺理成章地看作体现新社会进步的砝码；对照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的金玉良言，毛泽东相应地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想化口号；伴随着首部《婚姻法》的新鲜出笼，妇女解除了身上的枷锁，纷纷走出家门……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并没有平息下来，反而是愈演愈烈。很侥幸地，中国妇女从中受益，逐渐被视为完成了自身本质解放的平等成员，女性的各种政治、经济权利也相继得以被具体的法律条文正式确定下来。中国妇女抗争数千年的婚姻自主权、受教育权、社会择业权、财产继承权、子女监护权、同工同酬权、妇女享有三期保护权与被照顾权，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主流意识因而断定中国已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甚至有意地将女性地位提升至历史新高——与男性完全无差别的平等。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氛围中，“男女平等”的评判准则被迅速应用到社会的各行各业。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建国后，无所不在的女性神话在神州大陆争相崛起。不管在政府的宣传材料中，还是在人们的日常印象里，身披英雄光辉的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寻常可见。女性似乎总显得比男性还能干：文学作品中，李双双、蓝凤凰式的人物屡见不鲜；生产劳动中，“铁姑娘”巾帼不让须眉，成为无数女性的新楷模；而在政治方面，“女性参政”的迹象亦是见强不见弱。

“女性参政”，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文革”前它最鲜明、最典型的的表现便是“后妃参政”。专制的国家制度往往是“后妃参政”的温床，建国伊始，在由“党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中，中国高层政治生活中不乏“家族参政”的案例——江青、王光美、叶群等率其子女一股脑儿投身热闹纷呈的政治斗争，无疑是这一政治冒险行为的具体阐释。在党内的中底层干部中，“双职工”家庭大量存在，丈夫和妻子都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趋于平等。

笔者分析，正是由于新中国对女性地位的空前抬高，女性的自身权益得到极大满足，于是连带她们的政治热情也被前所未有地撩拨起来。在新中国女性心中，巩固社会地位的迫切渴求和攫取政治利益的贪婪念头搅和在一起，蠢蠢欲动，如秋日久旱之草原般一点就着。

笔者认为，女性作为弱势，要想改变已有的两性格局，可行方法之一便是依靠彻底的休克式“革命”来颠覆其千古未变的弱势地位，从而在新的社会分层中成为强者。“文革”前，中国女性追逐政治资本的社会氛围渐浓，已如危崖之石，静候一只提供推力的手。这只手很快就出现了，因为即将爆发的摧毁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无疑为她们打开了通向希望的大门。为了达到目的，就算是采取暴力、就算是被利用，她们也在所不惜。然而，历史的可叹之处便是，利用人者往往反被他人所利用。

值得对照研究的是，中国“文革”爆发的60年代，红卫兵造反运动也席卷了全世界。同时，蔓延全球的还有激进的女性解放运动，这次女权主义运动的行动目的是“解放”而非“自由”，革命是其终极目标。运动中，女权主义者所用的手段也够辛辣激烈：后马派学者希欧多尔·阿多诺在上课的时候，一群激进的女红卫兵学生袒胸露乳地闯上他的讲坛，指责他研究的马克思中没有“革命”的味道，这次公开的羞辱直接导致大师在不久后抑郁而死。女红卫兵的力量何其猛也！

## 二、女红卫兵的现在进行式：“文革”中她们的心理状态及真实处境

### （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阿妮达·陈在《毛主席的孩子们》里探讨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与权威人格的关系时，特别提到了弗洛姆的“权威人格”：“年轻的红卫兵，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的‘权威人格’：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自己。”（5）他们有强烈的献身精神，且对任何异端信仰持顽固的排斥态度。

“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红卫兵，也当然具有这种心态。她们虔诚、顺从地崇拜“大偶像”毛主席，也在内心深处崇拜羡慕着江青等“小偶像”，将其作为自己的追随榜样和努力目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也是可以不断被制造出来的，她们在崇拜偶像的同时，自己也被其他人崇拜着。这种回圈导致了红卫兵运动一浪接一浪，不断地“后继有人”，从而也使得投入政治运动的青少年年龄愈来愈小，那些不懂事的年幼小学生往往是最顺从的红卫兵。

“文革”中，江青的地位很高，很多的样板戏、影视作品中，女性不仅是绝对的主角，而



且很多女主人公的名字都是带水的（如柯湘、江水英等）。这些向江青献媚的宣传品，占据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它们所塑造的“去女性化”、与男性无差别的女性英雄形象，也深深影响了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女红卫兵一代人。

我们来剖析一个普通的女红卫兵申晓辉，她在《文革日记》中真切地记载下来了形形色色的“大偶像”和“小偶像”们，这些女偶像的鼓舞作用对身为女红卫兵的“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

“亲切的江青阿姨：我第一次看到了江青阿姨，她身穿军服，显得高大、英俊、有精神，说话声调很高，她支持我们的行动，说有人在迫害她，靠我们这些人进行斗争。由于受到迫害，她不得不在会议进行中吃药。”“北大附中彭小蒙（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宣传部长，以善讲演出名）是个优秀的演说家，听说她初中是女二十中的。”“想想‘7·28’展览馆的彭小蒙，再想想天安门城楼上的宋彬彬：我一鼓作气上了台，发表演说。想不到，得到了大家的强烈支持。”（6）

再来看《红色少女日记》中的张新蚕，她也拥有大大小小无数的“女英雄”作榜样：“今天见到了慈祥、勤劳、又朴实的好妈妈刘妈妈。”（7）（这种追寻“英雄母亲”的行为和当下少女少女们的“追星”相比，情感方式极其相似）“人民日报上登载7名女同学组成的‘中华儿女多奇志长征队’的报导。我要改造世界观。”“女共产党员王翠兰，以共产党员的气魄和超人的毅力，把无限精力投入到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之中。她的光辉形象深深地感染着我。被抓住之后，酷刑在她面前都一一失败了。学习英雄，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感到格外亲切，充满了无限的力量。我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8）

女红卫兵心目中的女性榜样还有很多：作为造反派头头的聂远梓、彭晓蒙、宋彬彬、谭厚兰等；作为“伟大的革命战士”的江姐、阿庆嫂、刘胡兰等等；还有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工农兵旗手郝建秀、邢燕子等等。以上女性的传奇神话都成为她们心中拼命追随的光荣与梦想，是她们行为举止的榜样源泉。

## （二）、女性的优越感和从众心理使然

很多女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中，显得特别耀眼夺目，她们政治面目纯洁、成绩优秀、行动坚决狠辣，连很多男性红卫兵都自愧不如。那是因为“在成为红卫兵头头时，她可能已经是学校的红人。有着骄傲的经历，或者是成绩突出，或者是聪明过人，或者是班级的干部，或者是学习尖子，或者是小美人，或者小有名气或者是所有都兼而有之。得到成年人的偏爱，享受着同辈的艳羡。”（9）笔者认为，因为在青少年早期成长阶段，女性身体发育、智力成熟水平都比男性来得早，所以她们往往显得比男性优秀，因此对男同伴、同龄人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文革”来了，她们毫不避讳对权力的热切追求，一如既往地努力维持她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争第一的野心。

另外，笔者分析，由于女同学一般能歌善舞，较之男性更适合承当文艺兵、广播员的角色，因而得以在各种表演活动中容易出风头，被快速地视作排头兵，从而走上政治斗争的风头浪尖。如上海第六女中红卫兵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常在外滩演出，大大强化了人们对女红卫兵参与政治活动的认可度；平日集会中，经常能听到“广播里传出了一个女同学铿锵有力地朗读最高指示的声音”（10），为政治作喉舌，这无形中赋予女红卫兵一定的权威性。由于这些女红卫兵的不俗表现，她们在民众心中留下了某种正统的、合法的、严肃的、受人尊重的良好印象。于是，社会默认这些女性走上街头，从事和男性一样的造反活动，甚至给她们以更高的评价。

“文革”中，一些具有领袖才能的女红卫兵确实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她们得到了女同胞的支持，也赢得了男性竞争者们由衷的钦佩，她们身上所散发出的个体优越性光芒四射：“红卫兵组织‘炮轰派’的女头头‘潘二嫂’，在我们的心中，她是比阿庆嫂更加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女豪杰！”“‘潘二嫂’是她的绰号，她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没有结婚。理论水平和宣传鼓动极高。”（11）

作为先行者的这一批女红卫兵们既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赏，后来加入的女红卫兵们自然也不甘落后、积极要求入潮流。因为身为女性，好像天生具有一种跟风、从众的心理。于是，女红卫兵的队伍一呼百应，应者纷纷，益发发展和壮大起来。

宋彬彬作为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她上了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名字，她名“宋彬彬”，毛不喜欢“文质彬彬”之意，对她说：“要武嘛！”她于是更名为“宋要武”，从此，反文尚武成了一些年轻人追求的特质。对于女性而言，不爱红妆爱武装更是成了当时纷纷趋同的“审美倾向”。

再来看一则反映“文革”中女性的从众心理的例子——她们往往善于得风气之先——“破四旧中，天那么热，女演员们带去的裙子都不敢穿了，知道那是‘四旧’。仍是歌舞团风头最健，尤其是一班跳舞的，个个苗条匀称脸蛋漂亮，说剪辫子，刷地一下全班变成了齐耳短发；说扔香水，刷地站一排比赛似地把花露水往垃圾箱里扔，像集体小合唱似的具有观赏性。”（12）

于是，一些女红卫兵常为跟不上“流行”而惊慌：“我常常为家里有保姆而惴惴不安，对父母的高收入而羞于启齿，生怕被同学们看成是资产阶级小姐。为了磨练自己，我坚持周末走一个多小时步行回家，而不坐公共汽车。我坚持和其他同学一样，喜欢穿有补丁的旧衣服。穿上一件洗掉、得发白、补著整齐补丁的衣服，心中畅快自豪，这与今天的青年人穿上一件时髦流行的衬衫心情是十分相似的。”（13）

可见，“文革”中，女红卫兵投身“造反”运动，有出于对信仰的纯洁追求，也有出于攫取优越感和政治权力的个人打算，当然也有纯粹的“跟风”的从众心理使然。这些复杂的心态构成了女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心理图景，引导著她们做出种种顺应运动潮流而动的举动。

### （三）、不得不进入秩序的无奈

法国女性主义在论证女性社会地位形成的过程中，引进了一个新概念——“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她们认为女性不得不进入现有的这种男性规定的象征秩序，进入的过程伴随著女性自身的性别特质和女性意识的丢失，即这种秩序虽然给了女性一个社会位置，但却是以压抑女性的潜意识为代价的。

我觉得这种理论十分适合于分析文化大革命中女红卫兵的社会处境。她们自愿或被迫，不得不进入“文革”的“造反”秩序（当然，用“秩序”这样一个概念可能有点不妥，因为进入“文革”，已是“无秩序”，不存在政治规划，也没有固定的运动目标可循，通行的游戏规则便是一派不断打压另一派）。因为只有进入这种社会规定的秩序，作为个体的人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并且只有根据这个社会规范的要求行事，个人才能有机会获得晋级、升迁的可能。

个人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下生存，飘摇无定，更遑论是女性。她们必须加紧依附现有的社会秩序。女性不得不进入“文革”的游戏规则，代价是和男性一样行事，而完全抹杀

掉自己温柔、善良、纤弱的所谓“女性气质”。

尤西林说：“文革中打人最凶者，往往有红周边”（14），这一道理，同样适合于女性。由于身体的原因，女红卫兵天然地处在弱势，她们唯有彻底、矫枉过正地抹杀自己的本性，改变自己的形象，才能获得“红卫兵组织”的认同，被承认为其中一员；她们的所作所为，必须表现得比男红卫兵更凶残，才能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政治空气。

特别是到了1966年的后期，红卫兵的造反已经升级到以武力斗争为主，“1967年夏季开始，暴力逐渐取代了辩论”（15），身体的武力和体魄的强健是获取关注的关键，同时也意味著更高政治地位的本钱。这是一个崇尚暴力的时代，不爱红妆爱武装。女性势必要对平日温良的习性作出反弹，以暴力行为换取发言权。

于是，一幕幕女性施暴画面出现了。也正是因为平时的柔弱，女红卫兵们向残暴的转变就显得格外触目惊心：

在球场的乒乓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个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第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了顶的头上，随即把他推倒在台上，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惊了。（16）

借助“暴力”作通行证，进入“文革”秩序后，女红卫兵们享受到了造反的满足感（特别是一些女红卫兵头头，凭藉此为政治资本，爬得很快）：

哈尔滨发生了一件给全市造成极大震动的事情——几个流氓光天化日之下，将一个中学女红卫兵劫持到一处建筑工地轮奸了。因此，全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击流氓的高潮。

轮奸红卫兵这种残暴的罪行，尤其在红卫兵们心中激起了报复的愤怒。她们对那些流氓比男红卫兵更手下无情。因为她们是中学女学生的时候，怕他们如畏狼虎。瞧著那些半年前远远第看见就使她们少女心中充满恐惧、唯恐避之不及的除了名的，她们认为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大流氓大恶棍一排排双膝跪在她们面前，战战兢兢，个个如犯了杀头之罪跪在女皇面前引颈待死的奴才一样，她们体验到了一种惩恶除暴的女豪杰般的救世气概和复仇雪恨的满足与痛快。（17）

但是，女红卫兵们进入“文革”秩序，失去的更多。

“文革”中两性间的性别压迫被“阶级论”所遮蔽，社会政治对于女性“去女性化”的性别阉割也往往被女性自己所忽视，可悲的是，她们往往还将此种压迫转化为对更弱者的压迫，这更弱者便是没有政治生命的人——那些被打倒者，再被踏上一只脚的平民。而且，出于嫉妒这一女人的天性，她们被男权社会所压，往往转压自己的同类，甚至更残酷（18）。女红卫兵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恶性，强迫她们的男性社会的“象征秩序”有罪，她们自己也有责任。

女红卫兵在迫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是受迫害者。实际上，与主流话语的表面文章相反，在社会生活中，女性总比男性承受更多的不公平待遇。妇女被赶出家门参加和男人无差别的社会劳动，但是平时赚取的劳动工分却是不一样的，男人10分，女人一般只有7分。在“文革”夫人道德惩戒中，男女关系被污蔑为“搞破鞋”，但是着重羞辱和打击的是身为“破鞋”的女性，男人常常逃过这样的公审。

不管女红卫兵们进行怎样的暴力行为，女红卫兵最后也还是成为不可避免的暴力受害者。

因为在红卫兵的派系斗武力争中，女红卫兵由于身体的缺陷，往往是无辜的受难者，成为运动的牺牲品：“在这场冲突中，我校一初中女生H胸部中弹身亡，她死时仅仅17岁。一名高中女生J失踪。”（19）“女性遭强暴也时有发生，红卫兵滋生了流氓作风。我校学生大部分是女同学，她们固然勇敢坚强，但万一战斗总被俘，遭到对方组织当中流氓的凌辱，后果就不堪设想。”（20）

### 三、女红卫兵的将来式：下乡插队后她们的命运何去何从？

1967年夏天起，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结束后，红卫兵一代人陆续走向社会，开始了为期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插队运动。女红卫兵转换为女知青角色，人生大大起大落，前途被完全扭转。笔者想要追怀的是女红卫兵们成为女知青后，她们的命运将以怎样的图景展开。

报“春”的第一燕便是邢燕子，1960年她的事迹受到表彰宣传，成为上山下乡知青的楷模。相信下乡插队后的女红卫兵们仍然是以她为榜样，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个毫无性别差异的“铁姑娘”形象。在有关回忆录里，这样的景象俯拾皆是：

我们那个连队的一位女性，身体很弱，患有较严重的胃病，初来东北根本吃不下那里的粗茶淡饭，每天只能卖点饼干充饥，即使如此，她仍然坚持每天下地劳动，干着和其他同学一样重的活。我们连还有几位女知青，看到男同学都扛着180斤的麻袋上屯，也要求扛整袋的麦子，看到她们走上跳板时的困难劲，使人不能不佩服她们的意志。她们也硬是这样坚持了下来，成为了有名的“铁姑娘”。（21）

究竟为何要做“铁姑娘”？笔者认为这和女红卫兵们虽然被贬为女知青后，仍然努力遵循“象征秩序”的心态有关，也与当时国家宣传的女性审美导向有关。后者将“男女平等”解释为“男女都一样”，让女性不顾其生理特点，硬去做男子做的事，这大概是今天的人对那一段历史批评最多、也是我们最需反思的地方。

这种平等是以男性标准为标准，以忽视女性与男性生理差别为前提，以女性努力去做“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去争取形式的平等，女性为此付出许多代价。与此相适应的是“去性别化”的性别文化和“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审美趣味。问题不在于是否赞美女人性化，而是对所有违背这一标准的“另类”产生的排斥（22）。

尽管女性一直努力遵循这样苛刻的标准，她们在插队生活及返城风潮中的遭遇还是比男性更加恶劣与不幸，从一些现象便可看出差别——比如男知青有参军的渠道，女知青没有；工农兵学员中，女性也就占到11%左右；到了70年代后，知青点存在“女多男少，女大男小”的现象，男女是很不平等。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根据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的统计，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7.1%……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达到了创纪录的86.1万人，占10%。”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小萌提供的资料，已婚知青中和农民结婚的超过70%，知青间结婚的，约20%，与城里人结婚的，不到10%，而且，更重要的是：“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23）。

正如冰冷的资料所告诉我们的，女红卫兵一知青中有很多人嫁给当地的农民，很多人被基层的掌权者所玩弄，很多人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献出了青春。

### 四、结语

“文革”十年之后，红卫兵作为一个团体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将女红卫兵剔除出来，单个研究，这样的著作笔者还未曾读到。笔者也无法忍受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对女红卫兵的种种不切实际的“意淫”想像——有人创作了主题为“女红卫兵”的系列油画，将她们想像成为黛玉葬花式的、挣扎于血雨腥风之中的性欲物件〔24〕。

在这篇文章里，笔者一一梳理了女红卫兵“文革”之前的社会境遇——“女红卫兵的过去式”，“文革”之中她们的心态和行动——“女红卫兵的现在进行式”，以及被发配下乡插队之后她们的遭遇——“女红卫兵的将来式”。通过追溯女红卫兵的“前世今生”，笔者也仿佛和当年年轻的她们一道，共同完成了一段艰难的心灵旅程。

而这篇文章，也算是献给她们的一次微薄祭奠。

抱憾的是，本文主要关注的是那些有“残暴”行为的女红卫兵形象，而缺少对“纯情善良”的女红卫兵形象分析，这是笔者以后阅读和思中考需要补充的一个方面。

注释：

- 〔1〕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页106。
- 〔2〕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页157。
- 〔3〕安文江：〈我不忏悔〉，载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页111。
- 〔4〕丁晓禾编著：《狂飙——红卫兵狂想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页90。
- 〔5〕〔美〕阿妮达·陈著，史继平、田晓菲、穆建新译：《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页257。
- 〔6〕申晓辉：《文革日记》，载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174、178。
- 〔7〕张新蚕：《红色少女日记——一个女红卫兵的心灵轨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页115。
- 〔8〕张新蚕：《红色少女日记——一个女红卫兵的心灵轨迹》，页242。
- 〔9〕〔美〕阿妮达·陈著，史继平、田晓菲、穆建新译：《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页27。
- 〔10〕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页74。
- 〔11〕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页306、317。
- 〔12〕沈虹光：〈大洪山中〉，载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236。
- 〔13〕黎若：〈走出藩笼〉，载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269。
- 〔14〕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载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10。
- 〔15〕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载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11。
- 〔16〕安文江：〈我不忏悔〉，载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94。
- 〔17〕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页150。
- 〔18〕具体案例可参见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页59、106。
- 〔19〕劳班：〈峥嵘岁月——成都武斗亲历记〉，载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126。
- 〔20〕劳班：〈峥嵘岁月——成都武斗亲历记〉，载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129。
- 〔21〕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页264。
- 〔22〕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页192。
- 〔23〕刘小萌：〈下乡女知识青年婚姻状况剖析〉，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页150—151、页153。

(24) 张大中油画中的“女红卫兵”形象曾引发众多争议, 张的油画代表作及有关该问题的论争可参见以下网路资料:

人民需要粮食: 〈张大中之《女红卫兵》〉(2007-7-1), 京华论坛网站, <http://bbs.qianlong.com/viewthread.php?tid=1146890&extra=page%3D2%26amp%3Bfilter%3Dtype%26amp%3Btypeid%3D48>

那日苏: 〈岁月留痕: 张大中作品《女红卫兵》〉(2007-2-5), 国际线上论坛, <http://bbs.chinabroadcast.cn/read.php?tid=280430>

□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号 总第68期

## 【书评】

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  
——推荐《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

• 舒 崇 •

今年7月, 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文革史研究专著, 书名是《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 由两位作者合着, 一位作者叫高树华, 原内蒙师院教师, 内蒙地区著名的造反派领袖, 被称为“内蒙聂元梓”; 另一位作者叫程铁军, 原内蒙师院学生, 80年代赴美留学, 获社会学博士学位, 现在澳门大学任教。这本书由高树华口述, 程铁军整理加工。全书共57章。正文之前有高树华写的前言, 正文之后有程铁军写的后记。

高树华前言的题目是“我的遗愿”, 写于2003年6月, 当时的高树华虽然还不满62岁, 但由于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 身体十分衰弱, 第二年就去世了。人之将死, 其言也真。高树华在前言里写道: “口述史的价值在于真实。顿悟之年, 大梦方觉, 早已看透一切, 所有褒贬毁誉, 皆已退居次要位置。” “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捍卫良知的传统, 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信条, 不会泯灭, 也不能泯灭。如果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问, 最终能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的话, 那么当事人的这种自我陈述, 也许能够成为新时代新学科的搜索引擎。为此添砖加瓦, 亦属幸运, 吾愿足矣。”

读这本《内蒙文革风雷》, 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首先, 这本书恢复了造反派的本来面目。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确实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合理成分。程铁军博士特地请提出“人民文革论”的民间文革史专家刘国凯先生为此书写序, 更加突出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

第二, 关于民族矛盾问题。早在文革发动之初,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就被打倒。当时给乌兰夫定下的罪名, 除了“修正主义”一条之外, 还有一条是“民族分裂”。其实这后一条纯粹是“莫须有”。作者指出, 在文革初期, 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成立, 内蒙文革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亲不亲, 阶级分”: “亲不亲, 路线分”。例如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范学院, 大多数蒙族同学都站在造反派一边, 和汉族同学并肩战斗。不是别人, 恰恰是中共领导集团自己, 骨子里却抱有“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的偏见。中央派出滕海清出任内蒙第一把手, 在内蒙地区发动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所谓揪“内人党”运动, 制造了一个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 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 有12

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 50 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族人数的 20 %。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到后来中共又重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意识开始抬头。“六四”之后，海外的蒙族人成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内蒙古人民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个大玩笑。

第三，高树华是内蒙师院教师，乌兰夫的第三个儿子力沙克也是内蒙师院的教师，两人本来是好朋友。在文革期间，乌兰夫一家都被打倒，高树华曾经冒很大风险秘密帮助过力沙克。然而等到文革之后，乌兰夫家族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高树华则被隔离审查。高树华的妻子向乌兰夫求援，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这件事表明，在文革的荒唐岁月，总还有些人，主要是平民，保持着某种善良的人性；它正和官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关于高树华暗中帮助力沙克一事，当时就受到各派的怀疑，但始终无法落实。直到高树华在晚年写回忆录，才披露了这段秘辛，否则这段历史悬案就永远也不可能澄清了。

文革已经过去 40 年了，但是，由于中共对文革历史的歪曲以及对文革研究的压制，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愈加扑朔迷离。文革的亲历者，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小将”，如今也多已步入晚年。抢救历史已是刻不容缓。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拿起笔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

□ 《北京之春》 2007 年 12 月号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